

儒学的省察与前瞻

蔡仁厚*

所谓“现在”，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点，而是随时都在向前推移的。现在是过去的累积，而未来则是现在的延伸。一切的学术思想，都是在浩浩的时间流里持续演进，不断开展，而当代的儒学，也是贯串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。因此，凡讲文化学术，皆应返本开新，以期慧命之相续流衍。

从孔子以来，历代儒者所诚心关注的乃是恒常不变的常理常道，是人类所当永远守护的生活规范与行为轨辙。理与事之间虽不免有落差，但依於儒家的经权原则与时中大义，随时顺事而因之、革之、损之、益之，也自能各得其宜，各得其成。因此，我们相信，顺应儒圣之道而为之，必可开创人类世界的光明与福祉。

一、近百年来的儒学之路

对东亚儒学而言，二十世纪乃是一个浪涛险恶的过程。从世纪之初中国五四运动所激起的“反传统、全盘西化”的意识，造成家庭、社会、风俗、教化、政治、经济……全面的大变革，传统的儒教文化乃逐步解体。到中国大陆全面赤化之後，孔子更被打成封建反动的代表者，於是“批孔扬秦、破

* 台湾，东海大学

四旧”的文化大革命，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。这是一场前古未有的大灾难，又岂是“十年浩劫”四个字所能形容！

总算苍天有眼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台湾作为文化复兴的基地，使我们有机会在惊涛骇浪中死里求生，而重新立定脚跟，站了起来，也使儒家从四面楚歌中，生发了四面作战的能力。而尤可庆幸的，是文革之后，大陆人文学界与知识青年在严肃的反思之中，有计画地研究当代新儒家的著作及其思想，渐渐地恢复理性，回归正常。循此而行，自将走出一条康庄的文化坦途。

在此，我不能不回溯一下当代新儒家的庄严奋斗。二十世纪中叶以来，在台、港、海外的新儒家，完全没有现实上的凭藉，但他们即以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为凭藉；新儒家也没有後台的支持，但他们即以全体中国人要求民族复兴、文化复兴的心愿为後台。这种凭藉，这种後台，它虽然不会主动地支持你，但如果我们能自觉地通接这一条源远流长的主线，汇合这一条浩瀚深广的洪流，那末，我们就会感受到一股“沛然莫之能御”的力量，绵绵不尽地鼓舞著我们，支持著我们。这个力量，足够坚定我们的信念，足够开拓我们的前途。这样的用心，这样的态度，才真正是熊十力先生所谓“空诸依傍，自诚自明”、“一切依自不依他”，也才算是真正内发的庄敬自强。据我个人的观察，似乎还没有见到有谁比新儒家更能动心忍性而庄敬自强的。当代的新儒家，可以说是在连续摧残中压不死的灵魂。

二、当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二个超越

1、新儒的学术贡献

当代新儒家，从梁漱溟、熊十力到唐君毅、牟宗三，代表了最核心的骨干。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努力，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，可以综括为五点：

1) 阐明三教：表述儒释道的义理系统

新儒家当然持守儒家立场，但同时也肯定佛老，认为在处理终极关怀的问题上，儒释道三教所开显的生命之道，都可以提供全人类来借镜和采择。所以，从梁、熊二先生以来，除了阐释儒圣之道，也同时讲述道家 and 佛教教义，唐先生更以通论通释的方式，对三教之学作了极大篇幅的讲论。而牟先生则以三部专书，来阐明三教的基本大义。以《才性与玄理》表述魏晋阶段的玄学，以《佛性与般若》表述南北朝隋唐阶段的佛教，前者可以说是讲魏晋玄学的经典之作，后者则是以中国哲学史的立场，来讲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发展。对于中国吸收佛教和消化佛教的过程及其意义，都有非常深透的诠释。对于宋明阶段的儒学，则以《心体与性体》四大册进行了全面的疏导，有关宋明理学系统分化的关键，以及本体的体悟与工夫的进路，都通盘而彻底地做了厘清和衡定。宋明清楚了，先秦儒也可以随之而清楚。同理，魏晋清楚了，先秦道家也可随之而清楚。牟先生这三部大著，无论思想纲脉的疏解，义理分际的厘清，以及系统纲维的确立，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通透。

2) 開立三統：疏通文化生命的途徑

民国以来，学界深识之士，也对文化问题有所反省，但多半是零零散散的意见，说不上是文化建设的蓝图。直到一九五八年元旦，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复观、张君勱四位先生联名发表文化宣言，才算对中国文化生命的“本性、发展、缺点”作了全面性的大反省。而牟先生的新外王三书：《道德的理想主义》、《历史哲学》、《政道与治道》，其共同的主旨，乃是本於内圣之学以解决外王事功的问题。归总而言，也就是所谓“三统并建”，承认在“道统”之外，还有“学统”、“政统”的问题。这是对华族文化生命的途径，进行通盘一贯的疏导。

这“三统”的意涵，在下文第三节“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使命”，将有统括的说明。

3) 暢通慧命：抉發中國哲學所涵蘊的問題

由於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傳統的隔閡與無知，誤以為中國文化是一個停滯不進的封閉系統。其實，在二千多年大開大合的發展中，中國文化不斷有義理的開新。中國哲學史上至少有十次以上的義理爭辯，每一次爭辯都含有義理的開創性。一是儒墨的爭辯，二是孟子對告子“生之謂性”的爭辯，三是魏晉玄學家之會通孔老，四是言意之辯，五是神滅不滅的問題，六是天台宗山家與山外關於圓教之爭辯，七為陳同甫與朱子爭漢唐，八為王龍溪與聶雙江的“致知議辯”，九為周海門與許敬庵“九帝九解”之辯，十為當前中國文化如何暢通發展的問題（內含破共、辨耶、立本、現代化四個問題）。這些爭辯，不只是反省地述古，而更是前瞻的開新。而如何暢通中國哲學的慧命，使之能真正進入世界哲學之林，為人類的人文世界盡其主導性的貢獻，則牟先生的《中國哲學十九講》，實已開啟新路。

4) 融攝西學：康德三大批判的譯註與消化

中國曾經融攝印度傳來的佛教，這是文化生命浩瀚深厚的徵驗，也是文化心靈明敏高超的表現。今後，我們能否像當初吸收消化佛教一樣，也來吸收消化西方哲學和西方宗教？其中有一個重要的關鍵，就是現代中國人能否像晉人、唐人一樣，也有意願和心力來翻譯具有代表性的西學經典。

牟先生以三部專著表述儒釋道三教之後，又進而翻譯康德之書。他不只是翻譯而已，同時還作“注”，一條注文有時洋洋數千言，無論疏解觀念或發明義理，都可以和康德原典互相印證，互相映發。這種“精誠貫注，譯解雙行”的工作，實可媲美於玄奘、鳩摩羅什之譯唯識論與大智度論。

譯、注之外，牟先生又特別撰寫專書來消化三大批判。以《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》、《現象與物自身》消化第一批判，以《圓善論》消化第二批判，以一百頁之長文〈真美善的分別說與合一說〉消化第三批判。這裡所顯示的智思與學力，自康德書出以來，也鮮有比倫。

5) 疏導新路：中西哲學會通的道路

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通，乃是一个大题目，一要通学术性，二要通时代性。西方哲学发展到康德，是一个大的综结。康德批判地消化了在他之前的西方哲学之传统，通过康德可以了解西方哲学的来龙去脉。因此，牟先生认为康德是中西哲学会通的最佳桥梁。他借用佛家“一心开二门”以为说，认为这是中西双方共同的哲学间架。中西哲学皆是二门（真如门相当於康德的智思界，生灭门相当於康德的感触界），但二门孰重孰轻，或是否已充分开出来，则彼此实有不同。顺此而涉及的种种问题，在他的《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》中，皆已作了层层之比对与透辟深细之疏解。

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，不但原先的儒释道三教和诸子之学要融通，而更要和西方文化传统相结合，要求一个大综和。根据自己文化的命脉，来和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、哲学，以及西方近代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综和。（对基督教则不是综和的问题，而是判教的问题。判教，是对不同的系统提供妥适的安排，使之各当其位，各尽其分。）

2、新儒的器识开扩：二个超越

1) 超越宋明

一般的论调，总以为当代新儒家是顺承宋明理学作讲论。其实，宋明理学家与当代新儒家的时空背景根本不同，面对的文化问题也不一样。当代新儒家的心态与表现，在下列三点上都是超越宋明理学的。

首先，宋明理学辟佛老，而当代新儒家则“辨佛老而不辟佛老”。儒家是道德的进路，佛老则否。但佛老的智慧也很高，佛家之缘起性空与道家之清静无为，代表他们的生命途径与价值取向，我们可以不赞同，不采取，但应客观地给予尊重。所以只辨异同，而不排斥。这是超越宋明的第一点。

其次，宋明儒弘扬孔孟，而贬视荀子。当代新儒家既讲孔孟，亦讲荀子，既讲程朱，亦讲陆王。理学家以为荀子言性恶，本源不透，但气性也是人性的一个层面，应予正视。而性理之学有不同的义理系统与工夫进路，

也应当兼权,不宜偏尊。故当代新儒家对于孔孟荀,对于程朱陆王,皆一体加以表述。而客观的表述,自然会有持平的批判。这是超越宋明的第二点。

再次,宋明儒尊立“道统”,功莫大焉。但一个大的文化系统应该不只是道统问题,在生命的学问之外,还有知识性的学问,还有政治建国的问题。前者属于“学统”(希腊传统的知识之学),后者属于“政统”。当代新儒家深知文化必须充实与开扩,所以主张三统同时并建(说详下文第三节)。这是超越宋明的第三点。

2) 超越五四

“五四”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关键,为了要科学,要民主,五四人物主张抛弃传统,全盘西化。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翻转。当代新儒家不走五四的路,而要返本以开新。归结而言,他们在下列四点上超越了五四。

不反传统。(积极肯定传统,通盘反省传统,因革损益,以得时中。)

不取全盘西化之说。(西学之长必须融摄,但儒圣道统无可取代,华族文化生命,不可西化)

确认科学民主,皆可从文化心灵(理性)中开显出来。(中华文化不反理性,当然也不反科学,不反民主)

开扩儒家的外王学。(外王不只是仁政王道,必须加入科学、民主,乃真能“开物成务”、“利用厚生”。此之谓儒家新外王。)

三、二十一世纪的文化使命

上文言及,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之第二点“开立三统”,已对文化生命的途径作了疏导,而完成这“三统”的实践,便正是东亚儒教的文化使命。

1、内圣成德之教的承续与光大(道统的光大)

每一个文化系统，都有它的安身立命之道。这个安身立命之道，包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精神生活的途径，同时也决定生命的方向和文化的理想。在印度、在西方、在回教世界，安身立命之道是由他们的宗教来提供，而在中国，在东亚，则由孔子的仁教(内圣成德之教)来承担这份责任。

这安身立命的内圣成德之教，是文化生命中的常道——一定常的骨干。在西方，文化创造的灵感是来自宗教。在中国，则来自儒家。儒家的仁教，不但(1)能建立一个“日常生活的轨道”(如人伦生活的规矩，婚丧喜庆的仪节，以及报本返始的祭祀之礼等等)，而且(2)能够开出“精神生活的途径”(就主观面而言，是人格的创造，成君子，成圣贤；就客观面而言，则是历史文化的创造)。这主客两面的创造，乃是维持生命方向与文化形态的问题，必须世代代永续永继。所以内圣成德之教(道统)的承续光大，在东亚文化未来发展的过程中，乃是最为首要的根本大事。

2、从德性主体开显知性之用(学统的开出)

以儒教为主流的东亚文化，偏重德性一面，而知性一面未能充分彰显。所以自古以来虽也表现了很高的科学心智，但却没有发展出知识性的科学传统。因此，必须自觉地调整文化心灵的表现形态，使知性主体从德性主体的笼罩之下，透显出来独立起用。

儒家传统的学问，虽然是顺“道德心”(德性主体)而发展，但也同样有讲论“认知心”(知性主体)的端绪，像荀子和朱子所讲的心，就是认知心。而朱子“即物穷理”的格物论，也透露主智主义的倾向，只要作一步转化，就可以成为“从儒教文化心灵中开出知识之学”的现成线索。

儒家在“生命的学问”(道统一面)之外，再开出“知识的学问”(学统一面，亦即希腊传统)，这是顺应时宜，极为自然的事。其中并无本质性的困难，“顾力行如何耳”。

3、由民本民贵落實於民主体制(政统的继续)

儒家“民为邦本”、“民为贵”以及“尊民意”(好民之所好, 恶民之所恶)、“重民生”(为民制产, 养生丧死无憾)的思想, 如能落實於体制, 就可以形成民主政治的架构。儒家的仁政王道、宰相制度, 都是好的。但那只是治权的行使, 至於政权的转移, 却欠缺一个法制化的轨道, 此之谓“有治道而无政道”。因此, 中国传统政治的三大困局(一是“改朝换代, 治乱相循”, 二是“君位继承, 宫廷斗争”, 三是“宰相地位, 受制於君”), 数千年来, 一直得不到法制化的解决。而近代民主政治的体制, 正好提供了“政权转移、治权运作”的轨道, 可以消解这三大困局。所以民主政治的体制, 正乃儒家求之而不可多得的法宝。(五四时代的人以为儒家反民主, 可谓器识浅陋。)

人类史上的政治形态, 首先是贵族政治(西方希腊时期与中国春秋时代), 再来君主政治, 到近代则发展出民主政治。就政治形态而言, 民主政治是最後的形态(如有更高的形态, 便是超政治的境界了)。至於民主政治的内容, 则因各个国家的历史背景、文化传统、生活方式、社会情态、宗教信仰、风俗习惯……等的不同, 而会形成“量”上的差异, 但从“质”上看, 则权利义务之对等, 与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设计, 乃属基本的架构。因此, 它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必须自我完成的客观实践。

民主政治, 不只是保障人权, 也是实现各种价值的基础。诸如人性的发扬, 人品的尊重, 人格的完成, 以及人道精神的维护, 乃至文学艺术、道德宗教等方面的精神价值, 都必须在民主体制中, 才更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和实现。

四、总结儒教文化的基本旨趣

十六年前, 我应邀赴日本东京出席东方思想前瞻年会, 在会上我曾揭示儒家思想的基本旨趣八大端。今天我愿意将语句形式稍作变换, 条列於下:

道德动源：人性本善(善出於性，理由心显)。

超越企向：天人合德(下学上达，与天合德)。

伦理思想：孝弟仁爱(敦亲睦族，仁民爱物)。

生活规范：情理交融(以礼为纲，以法为用)。

人生智慧：生於忧患，死於安乐(据理逆势，以理造势)。

历史原则：因革损益，日新又新(守常应变，与时俱进)。

政治哲学：以民为本，修齐治平(好民所好，恶民所恶)。

文化理想：内圣外王，天下为公(己立立人，世界大同)。

第一句肯定人有本善之性，自然也就可以扩充为善的言行。此一道德动源之开发，正足以使康德所讲的自律道德当下落实。第二句，天人合德，可以使人从尘凡中振拔而上达天德，以提升人类生命之意义。第三句，孝弟仁爱乃是人类之常性，不容间断。第四句，情理交融的生活，才是人的生活常态，也才足以显立生活的规范。第五句，指出忧患意识可以使人通彻生死的道理，进而显发人生的智慧。第六句，指出人类历史的演进，必须因袭好的、革除不好的、减损多馀的、增益不足的；如此乃能日新其德，开发新生命。第七句，指出政治不应陷於权力之争逐，而应该以民为本，以顺成修己治人的目标。第八句，指出文化之理想，在於推己及人，内外交修，以达致世界大同，天下为公。

据此可知，上面所提揭的，并不是几个通泛的观念，而是在东亚历史上，在传统的社会里，有过长时期的实践徵验，有过全面性的功能表现，证明这八句话所含的道理，确实可以作为“人类生活的基本原理”和“人类文化的共同基础”。不但二十一世纪可以行之有效，今後一千年二千年，也仍将可以显发它的意义和表现它的功能。而东亚儒学的未来，正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引申发挥，光大发皇。